

重点推荐

“工业化”不只是题材,而是一种现代性

——读《先锋:百年工人诗歌》

□于 坚

霍俊明这部诗集编得不错,也相当重要。许多诗选将送去造纸浆,但我想这本会留下来。从《唐诗三百首》到《先锋:百年工人诗歌》,这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但丁、白居易都是贵族或以贵族为荣,而惠特曼、波德莱尔、布罗茨基等都当过工人。卡夫卡是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的职员。“事实上,每首诗都像工作那样开始,但有望以魔术告终。每个周六和周日早上,我不用在工厂里拿锤子和扳手来干活,我坐下来,构思一首诗,写上几行,等待灵感,它迟早会来的。就像我给自己施了咒语,我的潜意识在起作用。这情形好比我在做梦,但这一个我可以控制的梦,每写一首诗我都学到一些东西。这就像我去了一个地方,接受神灵或缪斯的赐予,每次写一首诗,我都从中多学到一点东西,并且多年以来,我正在创作的这种大工厂的诗歌中,我努力探索,走出新路,在此过程中,这种知识,这种技能,是建立在每一首诗本身之上的。做一个工人诗人很够了,没拿文学博士学位,穿着白衬衫坐办公室,而是遵从我自己的狂热的、更富于创造力的想象。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我这个操作工每周48小时锤打和切削钢铁,然后坐在桌旁写诗,独一无二。”(美国工人诗人弗雷德沃茨2015年访谈)这也意味着,诗不再是某种“宅兹中国”的地方性事业,而是一种全球行动,甚至在主题上都有某种全球性。

我16岁的时候,被国家分配到昆明北郊一家工厂去当工人。我本来以为会像我父母那样,上学一直上大学。但是在1966年,我的命运被强制地改变了,脱离了经验中的常规路线,走向一个标新立异的方向。我记得1970年11月的一天,我背着一个背包,里面捆着被子、枕头和床单。我提着一只沉重的木箱子,里面装着一套换洗的衣服、一个笔记本、一块肥皂和两三本初中的教科书。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去干什么,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运走了我们的旅行。我们排着队,步行了两个小时,走到

■三味斋

薄凉人生与馥郁蜀葵

——读蒋殊《阳光下的蜀葵》有感 □徐文胜

蒋殊的《阳光下的蜀葵》再版了。从2014年初版后读者的青睐有加到售罄,到2016年一举获得“赵树理文学奖”,再到评论界屡屡自发地发声,如今“阳光下的蜀葵”已经被坊间不经意更名为“蒋殊的蜀葵”。蒋殊和蜀葵的标签,有了最大公约数,也有了蜀葵的书、画、声、屏等诸多衍生产品。

初读《阳光下的蜀葵》,我惊异于那些乡村的凡人琐屑,在蒋殊的笔下意趣盎然,仿佛童年久违的和煦,轻轻拂过。它能强烈勾起从前的记忆,引发共鸣,就像顽童把鸡毛掸子悠悠地挠到你脖子里,毛烘烘的,很享受;也像秋天柔柔的毛草穗儿擦过脸,有点轻微的痒。你愿意闭了眼,就让它挠下去,擦来擦去,不愿意拂开。

我尘封已久的乡村记忆闸门,是跟着蒋殊再回故乡老院,疯狂地寻找蜀葵过程中轰然开启的。一种普通的花儿,在她笔下生长出长的愁怨,不由跟着她喜,怒,哀,进而愧疚,恨时光不能倒流。

乡村生活就是乡村生活,不是觥筹交错虚与委蛇,不是吟诗赏月纵论家国,不是衣冠楚楚正襟危坐,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反,它是错综交织的麻团,是相互抱团的取暖,是家长里短的唠叨,是“小肚鸡肠”的计较,是青涩男女的擦肩而过,是热辣抱怨的“弦外之音”,是单调重复的劳作,是沉默如山的迎送,是简单深沉的寒暄……乡俗乡亲,乡规民约,道德法律,构成了乡村规则和运行流淌的交响。

蒋殊从这些庸常的生活咏叹调中,有了自己的发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她惊异于常人的坦诚,天生丽质难自弃之上的善良,成就了一个本色作家真、善、美的统一。她曾说:“抛开写作者不说,我认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善良,身上就必定同时具备真和美。尽管我常常被人利用我的善良,但我还是很幸运我与生俱来的善良。”

蓝石新近出版了小说集,书名是《但总有人正年轻》。这句话说的是光阴的流逝,一秋催一秋,一辈催一辈,过往和当下同在,遗憾与希望并存。对于这句话,作为小说家的蓝石有更深远的理解,这种理解蕴含在整个小说中,凝结为一个个人、朋友或陌生人的形象。蓝石写小说爱用自叙体、第一人称视角,叙述者总是以中年人的形象出现,在数十年的生命历程里信笔往返,故事的时间线被有意拉长,不同时空交错并置,新旧朋友交替出场,万千情绪杂陈压缩于克制的叙述和无言的结局。小说写的是生活,但没有把柴米油盐作为叙事的主体内容,和惯常的日常生活叙事拉开了距离。小说里有江湖侠义、暴力犯罪事件,但当然不是类型文学,也没有走传奇叙事的路子。小说运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观念和表现手法,但走得不远,没有跳出大众惯常的审美经验。从小说的部分篇目和局部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见废名、郁达夫、村上春树、太宰治、厄普代克、凯鲁亚克等作家的影子。艾略特认为,没有人能跳出传统写作,所有的文本必然与先前的文本有所联系。但我不知蓝石的师承,这些作家也未尝不是蓝石学习的对象,他们也许只是不约而同在某些句子里相遇了。

蓝石的写作最打动人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的诚与真。中国古来重视诚意的工夫,在文学创作中,诚意体现为诚恳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和处境,面对自己写作的对象,愿意而且能够准确地、不假作地把自己最真实、最隐蔽的生命体验灌注到自己创造的人物和事件上,让自己携带的精神信息在作者和人物之间无碍流淌,使人物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紧密联结。但是,“诚意”之难,难于上青天,否则圣贤谆谆教诲,所为何事?诚意需要强大的生命力来推动,但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不具备这样的生命力,也不能意识到自己的缺乏,有意无意放弃了这样的努力。此外,我们的日常语言有着巨大的惯性,“日用而不觉”,这也对我们在小说中“诚意”的努力构成了难以抗拒的阻力。“诚意”虽难,但仅有“诚意”也不能必然写出好作品。写出好作品还需要有“求真”的功夫,体现在小说的技艺层面上就是写实的能力。从蓝石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他“诚意”和“求真”的努力。他以最大的诚

工厂。我记得我们在大门口站着,好奇地看着那些穿着粗帆布工作服的工人走出走进。我不知所措,工人阶级是我完全陌生的一群人。我出生在教师与干部的家庭里,衣食无忧,满脑子都是书本。现在,忽然有人叫我去领工作服,接着,我领到一套蓝色的粗帆布(其实就是牛仔布)工作服、一双翻毛皮鞋、一双白帆布手套。那衣服厚重僵硬,穿在身上,我几乎无法动弹。

我与工厂格格不入,我非常害怕这里,尖锐、冰冷、危险、喧嚣,纪律严明、时间无情。我记得第一天上班,我师傅说,你这双手怎么干活嘛,像葱一样白。但我终于成为了一名熟练的工人,学会了许多技术。甩大锤、烧电焊、氧气切割、磨钻头、开天车、修理电器……我变成了一个每天动手的非常灵敏的人,可以把一辆自行车全部拆开再装配起来。而在我青少年时代的封闭世界中,动手被视为野蛮和弱智。我是在工厂的实践中领悟到西方文明,然后才在图书馆再次证实那些道理。比如海德格尔讲的尺规,我在工厂经常看图纸,感觉我的世界是在一张图纸上。而在我少年时代的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图纸。木匠打家具,从来没有图纸,只是靠经验,大概就行。我这一代人的工厂经验,是一种更深刻的“拿来”。如果五四时那些知识分子“拿来”的还是书本、概念,那么在我这一代人,西方已经不是别处、彼岸,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存处境了。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我相信现在的蓝领,读卡夫卡不会太费力。我在工厂工作十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被时间控制起来,几乎成了一个害怕时间、坚决地遵守时间、为时间焦虑的人。后来读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我经常想到游标卡尺,他也当过车工。我也学会了动手。我后来喜欢说“在场”“手边”“拒绝隐喻”,不仅是读书的结果,而是经验的结果,在工厂如果说总是言此意彼的话,你无法干活,容易出工伤事故。语言必须准确地直指事物。你不能说锁链,得说三环链。30年后,我在美国弗蒙特写作中心,发现那里的每一位诗人和艺术家首先都是工人,他们修汽车、切割钢板、干各种活计。我在一盘录像带里看见德国画家基弗,穿着灰尘扑扑的白工作服,开着吊车。我的朋友,美国后纽约派诗人罗恩·帕特就是这样,他花五年时间自己盖了他的林中小屋,这位教授自己修理他的汽车。

工业化意味着汉语诗人现在是在与乔伊斯、卡夫卡、金斯堡、波德莱尔们在一起时空中写作,不再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性知

识。工人诗人天然倾向于左派,“列宁旗下的一个班”。汉语的疆域已经扩大,现代汉语能否穿越时间还不知道,但已经可以编一本书置于书架,起码不是陈词滥调。山水中国的文人诗现在出现了锻工、车间、流水线、螺丝钉这些词,这才是新诗的先锋——现代性。

卜之琳曾经批评新诗“新瓶装旧酒”。他说得对,许多新诗到今天依然在新瓶装旧酒,写的是现代汉语,意识深处依然是才子佳人、夕阳流水,甚至鲁迅深恶的“花边文学”。这本诗集在百年中国的文学史上相当重要,是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就诗来说,工人并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现代精神,现代性其实就是一种审美唯物主义,但这是一本抒情诗集。这种矛盾的呈现,正是这部诗集的价值所在,工人、现代性拒绝小资产阶级的感伤,新诗天然被赋予了一种左派气质。这也是这部诗集某些篇章(第四集)偏弱的原因,作者们似乎又回到感伤去了,工人被作为一个题材而不是现代性。

读者或许会将它看成一部次要诗集,他们期待某种所谓的纯粹。他们不知道,诗不在于修辞纯否,而在于教化之功。“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教。其或感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世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于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朱熹《诗集传序》)就诗人而言,当然可以写不教之诗。但是就诗集而言,如何教化、教化何言,必须考虑。蕲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之所以流传,因为他知道读者需要什么教化。

诗在技术时代依然保持着优势,当艺术的灵性日益被复制取消,走向商业、儿戏,诗依然无法被复制。技术已经复制了几乎一切,包括基因,但诗依然每一首都独一无二。新诗连格律的束缚都没有,是自由的蓝调。

“文学力图给事情蒙上一层舒适的、令人高兴的光,而诗人却被迫把事情提高到真实、纯洁、永恒的领域。文学寻找舒适安逸,而诗人却是幸福幸福的人,这与舒适相去十万八千里。”(卡夫卡)是的,幸福必须再次寻求。

“别只走自己的一边,你得两边都走。”(马塞尔·杜尚)工人诗歌值得研究,我想,现代性在中国不仅仅是些概念,也可以从研究这些当过工人的诗人的诗歌入手。

中村,还有多少“明子”们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心力,艰难而倔强地奋争,希望有个比乡村好的日子,这个梦,什么时候圆呢?

《浩荡的羊群》里,蒋殊把目光投射到一个羊信身上。这个乡村的边缘人物,毫不打眼,却结结实实是乡村的脊梁。他的种种“好”,是在死后若干天才被村里人发现的,并引发了良心觉醒和善良重塑。他被隆重回忆,隆重下葬。这些村里的最高礼遇,给一位生前被全村人忽略的人。在这里,人性的细腻,被书写得淋漓尽致,荡人心魄。

值得指出的是,《漫山遍野寻姥姥》是蒋殊书写亲情的又一篇巅峰之作,有汪洋恣肆、奔流不息的气势。这个在去世时她“居然被亲情麻木、没有流出一滴泪的姥姥”,自然是一个具体的存在,但更是一个意象。姥姥一度冷如冰”……这些人的局限、情境的局限也包括时代的局限,都曾在蒋殊的内心世界掀起波澜,也不乏小女人的抱怨,然而,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败给她自己的善良和格局。包容一切,理解一切,泯灭于风中、飘散于无形了。

《阳光下的蜀葵》初版中无管也有别离、死亡、失落的碎片,但仍是以明媚、温馨为底色。再版(珍藏版)中增加的篇目,却是沉重、压抑的多,一下子让这本书厚重了若干,发人深省,启人心智。

新增篇目,主题主要是失去和死亡。流驶的无情时光,总是让乡村增添人生的薄凉意味,温馨的东西在稀薄。但,这又何尝不是生活的真实,抑或真实的生活!

《被岁月掩盖的酒窝》中堂弟“明子”,是鲁迅笔下闰土再生的现世状。一个纯洁、羞涩、稚气的乡村少年,在生活的蹉跎下,变成一个饱经沧桑的早衰者。社会是万花筒,也是大染缸。离开乡村的明子,到底在新的规则下,经受了怎样一个蜕变历程?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但,亲情的疏离、城乡的隔膜、艰辛的磨砺,已然既成事实,并惯性运行下去。明子,还能回到曾经那个酒窝少年吗?显然,不可能了。城市的工地、窝棚,五光十色的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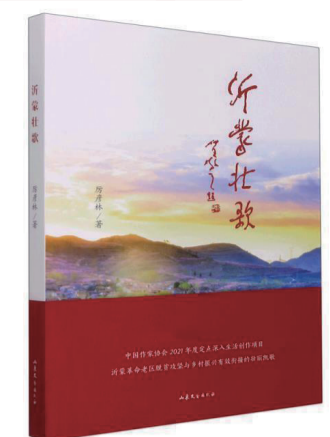
且认他乡作故乡

——读蓝石《但总有人正年轻》 □刘闻攀

意面对笔下的文字和人物,以谦逊的态度审视和反思自己的人生经验,以平等之心关注平凡人物,并烛照出平凡人物惯常生活中的琐碎欲望,尤其是行为背后的道德挣扎和伦理困境。小说集中的《朋友一场》等篇目,显示出作者高超的写实水平,虽有匠心但不落痕迹,叙述自然,行文自由无碍,呈现出一个成熟小说家的功力。但蓝石并没有将笔下的人物“典型化”。雅克·德里达认为,观察世界的准确标准不在于永恒的共性而在于事物的差异性,我想蓝石也许是认可这一点的。

蓝石擅于写家乡的“朋友”,小说集中的绝大部分篇目都是在写“朋友”,如《朋友一场》《年三十三》《极度寒冷》等等。蓝石的小说源于经验写作,我不知道小说中的故事是否真有其事,但我觉得他的写作应该是“情真实而不必实”。蓝石写“朋友”,其实写的是平凡人物的情与义,写的是家乡沈阳的平民文化,写的是传统社会规范对人的影响和约束。比如小说《朋友一场》中,作者将一件小事写得波澜起伏、五味杂陈,其中人物行为的驱动力正是情义。在小小说的其他几篇小说中,情义也都处于小说的中心位置,是调节规范社会关系的主要力量,而现代的法律手段等社会关系的调节方式在小说中长期处于缺位状态。这也正如费孝通所分析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调节不是靠法律来调节,而是靠“礼”这种社会规范来调节。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通过不断重叠、蛛网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到其他人,进而对整个社会营造一种合适秩序。我不知道蓝石所表现的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是否存在,也或许作者的追忆本身就是对情义消逝的怅然?又或许,这种“情义”本身是一种甜蜜的负担,让人想要摆脱但又难以忘怀,想要维系但却失去了往日的力量和心境……

百家品书



《沂蒙壮歌》是山东作家厉彦林继《延安答卷》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该书全景式记录了沂蒙老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传承和发扬沂蒙精神,在镌刻着红色印迹的土地上谱写出的“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的壮美华章。作者把书写中国当代山乡巨变的目光聚焦在沂蒙山区普通百姓身上,从平凡的生活中再现农民的生存图景和历史命运。作品在沂蒙精神的与时俱进、精神特质以及思想启迪三个维度上,体现出作家关于精神力量和时代抒写的思考,是记录当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不可多得的艺术样本之一。

该书在对沂蒙老区的发展史进行追溯和讲述的时候,不仅展现出沂蒙精神形成发展闪光聚焦的因素和历史轨迹,同时也褒扬了沂蒙精神与时俱进的鲜明品质。革命战争年代里,沂蒙精神主要表现为对党和军队无比忠诚和热爱、对共产主义信仰无比坚定、勇于牺牲、勇于奉献;新中国成立后,沂蒙精神主要表现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为新时代的“美丽中国沂蒙版面”增添了宏伟壮丽的色彩,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沂蒙精神与时俱进的一面。作者着重讲述了沂蒙革命老区的核心区临沂市实施精准扶贫、全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沂蒙特色”的奋斗历程,呈现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及持续提升的良好态势。一系列举措充分反映出沂蒙老区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亮点频出,呈现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路。

《沂蒙壮歌》以党的百年奋斗史和沂蒙老区的历史文化、革命思想、爱国思想、民族思想、人道思想、经济思想等为叙述经线,以老区人民的不懈奋斗为纬线,从经纬交织中透视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特质,蕴含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哲理,使作品拥有鲜明的历史演进性、主体自主性以及时代创新性。

首先,作者运用敏锐细腻的思维、大气磅礴的笔调和严谨务实的态度,将笔触伸入到沂蒙老区脱贫史的深处,努力彰显“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奋斗历程及重大意义,揭示一个先进政党的何以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使沂蒙老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温饱不足迈向小康富裕。作者将临沂市这些年的实践经验客观地展示出来,概括出“坚持”“两面一线”,彻底把“穷根”铲除”,进而揭示了沂蒙老区的扶贫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个由低层次扶贫向高层次扶贫探索探索和递进的伟大进程。这个进程,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如何攻坚克难,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脱贫奇迹,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其次,作者在长期资料积累的基础上,为读者呈现出一群朴实而坚毅、平凡而伟大的新时代先进群像。他们中有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的扶贫干部王玉威,有顽强拼搏、倾力奉献、扶危济困的“沂蒙扶贫六姐妹”,有同时考上研究生、利用假期为村民开设学习班的贫困残疾人赵娟的两个女儿,有返乡创业、带动乡亲们脱贫致富的一群有志青年,有“一对一”帮扶孤贫儿童的临沂“孤贫儿童志愿者服务团”的志愿者们……这些鲜活事例和典型人物跃然纸上,生动感人,突出了沂蒙百姓“铭记党恩、永远跟党走”的心声,彰显了沂蒙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扬,从而为沂蒙老区的可持续发展输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沂蒙壮歌》开篇便写道:“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已在2020年历史性画上句号。这是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是让国人骄傲自豪的特大喜讯!”毫无疑问,这是最接地气、最具豪气的“新时代中国故事”,而对于沂蒙和沂蒙民众故事而言,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国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该书之所以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中蕴含着“党的立场、百姓的心”。作品既饱含着作者对党、对沂蒙父老乡亲的忠诚、敬畏和感恩,又饱含着游子对故乡旧貌换新颜的个性化体验与抒情,切实达到了“情深而文实,气盛而化神”。如果说厉彦林用心去体验作家的现实职责和使命,努力传递报告文学应有的精神力量和时代风貌,那么读者去读,则能加深这样的理解:沂蒙山早已矗立在沂蒙儿女乃至全中国人民的心中!这无疑是一次陶冶情操的心灵之旅,构筑健全的历史记忆和精神信仰,扬起精神探索与民族复兴的奋进帆帆。从这个意义上讲,《沂蒙壮歌》的确让读者穿越时空隧道进行了一场现代的启迪。

纵观《沂蒙壮歌》,这是一曲人类摆脱贫困落后、奔向幸福生活的新时代凯歌,体现了党、国家和人民群众无愧于时代的召唤和需要,凝聚磅礴的精神力量,共同抒写新时代伟大事业的精彩华章,也为人力减贫进程贡献了更多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力量。由此而言,读懂了这部书,便读懂了沂蒙精神的新内涵新价值,读懂了沂蒙老区在新时代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蓝图,也便读懂了新时代中国故事的重要篇章。

凝聚精神力量 抒写时代华章

——评厉彦林长篇报告文学《沂蒙壮歌》

□季毅然

